

中青年学者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前沿研究丛书

翻译诗学

刘华文 著

TRANSLATION
POETIC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中青年学者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前沿研究丛书



刘华文 著

TRANSLATION POETIC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诗学：汉、英 / 刘华文著.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6

(中青年学者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前沿研究丛书)

ISBN 978-7-5135-6174-7

I. ①翻… II. ①刘… III. ①诗歌－文学翻译－研究－汉、英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4873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李婉婧
封面设计 高 蕾 韩 雪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6174-7
定 价 39.6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61740001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平行语料库协助下的汉英翻译认知诗学研究”成果

丛书序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语学科的学术研究呈现繁荣的局面，不仅学界专家、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热情持续高涨，而且申报项目、出版论著或者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也大幅度提高。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供的数据为例，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申报总数为28,186项，其中30-45岁这一年龄段共有17,729人申报，占总申报量的62.9%；经过评审，共有2395人立项，占总立项数的62.7%。这表明包括外语学科在内的中青年学者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外语学科的研究者除了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的论文之外，还不断开拓论著发表渠道，通过创办学术集刊等形式表达和传播学术思想。据统计，近年来，各高校创办的外语集刊达几十种之多，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也逐年增加。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归功于研究者们探索新知的内在需求和国家激励学术创新的外部环境。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青年学者仍然面临着专著出版难的问题。尽管他们大多在国内外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思想活跃、心智敏锐，能够迅速抓住学术前沿话题，撰写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常常陷入出版难的窘境，即使几经周折得以出版，也是“零散型”的著作，淹没在书海中而难以产生较大影响，更无法形成“集约型”效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极大的智力资源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中青年学者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中青年学者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希望。为了保护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热情，推动他们在学术前沿勇于探索，多出成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秉承“开放性、学术性、原创性、前沿性”的原则，设立“中青年学者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前沿研究丛书”出版项目。“开放性”就是对全国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开放，凡是希望通过这一项目出版外国语言文学类各领域研究成果的中青年学者，皆可申请加入；“学术性”是指研究成果具有较深刻的学术思想和观点，能够反映外国语言文学各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本质和规律；“原创性”就是发前人所未发、想前人所未想，在研究内容和形式上有创见和创新；“前沿性”是指研究成果反映外国语言文学各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具有前瞻性。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外国语言文学学术研究的内容和形式

发生了变化，并呈现交叉融合的趋势。因此，我们鼓励中青年学者以问题为导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视角，对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外语教学等诸多方面进行跨学科研究，力争推出一批集学术性、原创性和前瞻性为一体的最新研究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语言文学学术话语体系。

首批入选“中青年学者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前沿研究丛书”的专著共有十本：《教育语言学——一个社会符号的模式》、《文学交际中的读者：叙事虚构作品解读的自由与局限》、《翻译诗学》、《中国晚期二语习得者英语被动句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行为与脑科学的整合研究》、《萧乾文学翻译思想研究》、《詹姆斯·马丁访谈录》、《英汉语篇跨文化修辞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强调语的语用分析》、《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强化语型式和意义研究》和《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外语教学等不同领域。

“中青年学者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前沿研究丛书”注重质量和创新。首批入选的专著均经过专家审读和评阅。为确保丛书的学术品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将聘请资深专家担任系列丛书的顾问，并成立由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领域知名学者组成的编委会，对申请出版的学术专著进行评议和遴选。本丛书项目将按照相关质量标准，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入选者列入出版计划。

我们秉承严谨治学的态度，希望通过学术出版为学术传承与创新提供平台，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恐有疏漏之处，恳请诸位专家和学者不吝指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

2015年9月

本书序

刘华文教授诚请我为他的新作《翻译诗学》作序，虽然工作甚忙，但我欣然接受邀请，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翻译学是我一直很有兴趣的研究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最初途径就是翻译。我涉足翻译较早，20世纪80年代初，就和几位友人翻译过几部英美小说，1985年还在当时风靡全国的《译林》上发表美国长篇小说《误诊》的译文，当时着实激动了好几天。后来转向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但翻译一直是无法割舍的学科和经常使用的研究工具，因此一直关注国内外翻译学的动向和发展。2007年我成为达拉斯德州大学翻译中心兼职教授，并担任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的会刊《翻译研究》的国际编委和审稿人之后，翻译学又重新进入研究的视野。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中，目睹西译汉洪流滚滚，而汉译西只是涓涓细流的情况，我于2009年与德州大学翻译中心就如何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共同举办了一次国际翻译研讨会，参会者是来自德国、英国、瑞典、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等好几个国家的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会后，我请与会者把会议论文修改充实，最后全部论文经笔者编辑整理成书，题名《向西方读者翻译中国：反思、批评、实践论文集》(*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 Reflective, Critical and Practical Essays*)，已于2014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编辑成书的过程中，由于一位与会者因故不能提交修改的论文，本来定好的三大部分就缺了一篇英文文章，正当我为如何约请到另一篇英文文章而踌躇不决之时，我突然想到了刘华文教授。在此之前，我在南京大学讲学时结识刘教授，承蒙他慧赐译学文章，阅后深为刘教授的广阔视野、独到的见解和扎实的学问所折服，而且英文也写得地道流畅。此时既然文集需要另一篇英文文章，我就请刘教授根据文集的要求重新修订他的那篇文章，修改后的文章与文集的主旨和编辑方针十分吻合，因而略加编辑就被收入文集。

《翻译诗学》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事实上该论著可以说是填补了国内翻译学的一个空白，这也是我多年希望见到的翻译学专著。中国翻译界已经对翻译理论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如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和扬州大学的周领顺教授等人的

研究很有价值。但窃以为就翻译诗学而言，国内翻译界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有一些需要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其问题之一是，除了一些研究以外，主要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介绍、汉译国外的翻译诗学理论，真正算得上独立研究的成果不多，有新意的研究更少，这不仅是翻译诗学领域的不足，也是整个翻译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即使是一些不错的翻译诗学研究，也主要是套用西方的诗学理论，结合一些中国的材料，既缺乏原创性，也没有系统性。第三个问题也是整个翻译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翻译研究大多局限于低层次的实践，运用一个西方理论，结合一些译本的具体事例，得出一些经验主义的看法和方法，极少上升到概念性的理论层次。几年前，我曾跟许钧教授谈论过国内翻译学的现状，我们的共识是，翻译研究如果不能上升到以哲学和美学为基础的理论高度，翻译学很难真正成为一门有价值的独立学科，也难以对翻译实践提供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翻译诗学》的问世之所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也与我教学生涯中一个经历有关。我曾有过一个从事翻译研究的研究生，在指导其选择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建议其作中国翻译理论或诗学的研究。但该学生可能是在国内读了较多的西方翻译理论译介，出国后受到更多的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认为翻译理论应该只有一般的翻译理论，而没有所谓国别的翻译理论，更没有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我指出翻译的媒介是语言，内容是文化，既然有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翻译实践，也就应该有不同的译学理论。我还指出，国内自汉代以来有大量有关翻译的论述，实际上已有一个隐性的中国译学理论体系，关键是怎样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念用现代的方法归纳提炼并构建成反映中国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特征、符合中国译学历史发展和翻译实践的翻译理论。我还建议将现代的翻译理论和中国的诗学和美学相结合，定能做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遗憾的是，由于这位学生中国诗学功底不够，没有看出将翻译和诗学相结合的良好前景，因而并没有接受我的建议，最终放弃了这一选题。我清楚地记得，这位学生认定没有所谓的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虽然国内有不少学者鼓吹建立中国的翻译理论，但直到前几年也没有搞出称得上“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仅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没有所谓的中国翻译理论。这位学生的观点并不是凭空杜撰而来的，而是建立在对中国翻译现状的考察之上。的确，国内对中国翻译是否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罗新璋先生就认为：“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

其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¹他进而将中国翻译理论归纳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大支柱支撑的体系。但不少学者持相反的看法，王东风教授就认为：“中国译学界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口号已有多年了，但至今似乎仍停留在口号上。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在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上，中国特色‘特’在哪里，一直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²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根据，比如对于前一种看法，我是持同情态度的，且相信中国两千年的翻译实践和论述自有其内在的、至少是隐性的理论体系。但后一种看法在十几年前的确反映了译界的现状。面对学生振振有词的看法，我并无有力的回应，只能说，可惜我现在的兴趣不在翻译理论，而且手头已有的研究项目也忙不过来，否则，我就会专攻中国翻译诗学，以实践证明可以建立中国的翻译理论，而且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人把现代理论和中国译学的历史实践相结合，做出中国的翻译理论。刘教授《翻译诗学》的问世不仅填补了中国翻译界的一个空白，而且对持怀疑态度的诘问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以上的看法只是我欣赏《翻译诗学》的间接理由，直接的理由还是该论著本身。该书有很多令人惊羡的地方，在此我只想略述一二。第一点也是我最看重的一点，即难能可贵的求新思维和创造性。像中国人文社科其他领域一样，翻译界为西方翻译理论所主导，几乎处处唯西方马首是瞻，言必称西方某某译学家的理论，而中国的翻译研究和实践却成了证明西方理论的陪衬。对西方理论的迷恋甚至忘记了中国那句有名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格言，而把西方的理论视为应该收集珍藏的瑰宝，作为博学多闻、学术精湛的标志。我并不是一味反对引进西方理论，其实我自己对西方理论就有一定的研究，而且一直在运用。我反对的是照搬西方的理论，不顾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特点，将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削足适履地从属于西方翻译理论。我曾同一位研究翻译的学者讨论过西方翻译理论的普适性，以及是否应该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并认为鼓吹所谓“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人其实是受到了所谓“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的影响。这样的看法不仅是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表现，而且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萎缩而引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惰性，根本无法胜任建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重任。刘教授《翻译诗学》是建

1 罗新璋.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1.

2 王东风. 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 中国翻译. 1999（2）：22-23.

构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和话语的一次成功尝试，堪称把西方翻译理论与中国翻译实践创造性结合的良好示范，也是对迷恋西方理论的有力批判。

其二，该书理论结合实践，不仅有纯思辨性的理论建构，而且理论联系翻译实践，可读性很强。国外的翻译诗学大多是比较抽象的研究，可读性不是很好，联系中国翻译实践也有一定距离。比如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国内已有两个版本，这是一篇被称之为如果不读就谈不上做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作，但我在国内讲学期间曾问过不少从事翻译的学者和研究生，大部分人要么是没有读过这篇文章，要么就说文章太深奥，读过以后不好理解。后一种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本雅明的文章虽说是在谈翻译，其实是精深的诗学，没有一定理论功底的人读起来感到吃力是情理之中的事。相比之下，刘教授的《翻译诗学》既涉及高度抽象的哲学、美学、诗学和当代理论，也兼顾概念性探讨的对象，如翻译涉及的语言、文化、历史语境，甚至还探讨了具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因此其高度概念化的翻译理论获得了坚实的翻译实践的支撑，使有深厚理论功底的学者和年轻学者读起来都能开卷有益。其三，建立了一个宏大而又落实在中国语言、文化、历史、思想基础之上的理论框架，该书的网络辐射状组织结架及其涉及的众多领域让我想起了《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许是巧合，两位作者都姓刘，而且都是山东人。但让我想起刘勰更是因为《翻译诗学》的框架结构以及写作方式，我冒昧地猜测，刘教授在发奋撰写其论著过程中，很有可能是怀着与刘勰在撰写《文心雕龙》时一样的勃勃雄心。不管我的猜测是否正确，我个人认为，《翻译诗学》已经初具中国译学的《文心雕龙》之风范。

该专著的令人称道之处还有很多，在此不必一一道来。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该书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之处。其呈现为网络辐射状的全书架构，虽然可以面向过去，面向西方，面向中国古典诗歌及其翻译，面向中国古代译学理论和文论资源，甚至面像未来，但这种散点透视式的框架既有面面俱到的好处，又似乎给人以一以贯之的立论略显不足的感觉。换言之，我希望能在导论或结论中看到有一个章节，从宏观的视角把握中国翻译诗学，得出一种统领全书主要观点的核心观点。我认为这种核心观点其实已存在于该书之中，但有待于作者将其归纳提炼出来。另外有些地方也显得过于简略，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拓展。该书尽管已是构建中国翻译诗学理论的了不起的尝试，但我相信，刘教授一定不会满足于初步的成就，而会进一步充实完善。我衷心希望刘教授进一步思考如何找到统领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核心立论，并深入和扩展书中

的主要命题，使之真正成为中国译学的《文心雕龙》。总而言之，该书是刘教授多年研究翻译理论的结晶，精当地将翻译和诗学、中西哲学和美学、中西文论和语言理论、中国译学史料和翻译实践相结合，已初步构建成一个学贯中西、打通古今、理论联系实践的体大思精之作，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中国翻译诗学。我认为，这是从事中国翻译研究和实践者的必读之书，也是从事文论、诗论和文学创作者值得仔细一读的好书。

顾明栋
2015年4月22日于美国达拉斯

前　言

诗学既可以广义地理解也可以狭义地理解。从广义上讲，有政治诗学、身体诗学、叙事诗学、认知诗学，等等。而这本书的诗学概念是狭义上的，即关于诗歌的理论话语。那么这里的翻译诗学就是关于诗歌翻译的批评话语，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古典汉诗英译的批评理论话语。在翻译诗学的理论框架的建构过程中，西方诗学理论也得到了充分的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诗学也有着比较诗学的意味在里面。这本书的研究范围包含诗歌翻译的形而上学、转换生成机制、意向性、译者的焦虑问题、物我关系、言、象、意之间的互动、互文性、化境、体现论、肉身化、绘画理论、美学感应、批评范畴以及审美距离等等。上述所涉及的论题对翻译诗学的建构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着眼于本体论视角，研究认为理想的诗歌译者在实施翻译的具体过程中进入的是一种物神游的“神思”状态，力求还原原文的“第一自然”，而不似西方文论的“想象”那样打造一个有别于原文“第一自然”的第二自然，以便让译文取得对原文的有机“化通”。诗歌翻译既然是一个“化通”的过程，那么就可以从通变论的角度审视原诗同译诗的关系。原诗和译诗之间是“正变”关系，也是一种潜在性地一对多的关系。而这一通变过程具有转化性、生成性、差异性、同一性和会通性。其中生成性是翻译通变过程中的核心特性。诗歌翻译的意义生成结构是由诗言、诗意、通和变构成的矩阵结构，这四项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驱动力来自于“反者道之动”（老子）这一通变机制。

从主体论上讲，诗歌译者实施的是一种意向活动。这一活动的重点体现在对原诗创作意向活动中意向性质和意向质料及其统一体意向本质的还原。意向内容的还原度不同译诗对原诗的关指度也不同：其中有译文对原文的实关指、虚关指，以及零关指、浅关指和深关指。不同的关指度与译诗对原诗是构造关系还是包含关系有关。从主体论视角探究诗歌翻译还要落实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面。诗歌翻译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施为行为，具体表现为格物、感物和体物这三种关系之上。一般来讲，这三种成诗方式实现的诗歌文本在翻译中如果采取的是同样的成诗方式，译诗就会继承原诗的审美品质。

英语和汉语的构成维度存在着差别。从两种语言的发生阶段开始，汉语属于三维语言，即由言、象和意三个维度构成，而英语属于二维语言。在古典汉语诗歌中，“言”和“象”这两种分别代表着概念思维和象思维，两者共同服务于“意”的表达，其中“象”提升了“言”的表达力。但是以象表述作为诗性表述特征的中国古典诗歌在翻译成具有言表述特征的英语时，翻译者需要进行言表述和象表述两种表述方式的选择，选择的结果影响着译诗对原诗诗意、诗性和诗质的表达力。既然中国古典思维是以“象”思维为其基本特征，那么，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应该重视对原有意象的保留，这个翻译理念反映在了叶维廉的诗歌模子论中。叶维廉充分意识到了中西诗歌之间的异质性特征，制定了“模子论”用于在诗歌翻译中让异质性特征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他的诗歌模子论涵盖了诗歌的阐释过程、诗歌的表达过程和诗歌的接受过程。模子论所体现的这三个过程分别受到三种理论的支撑，即传释学、道家语言观和主客关系论。他希望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中建立与原诗相似的模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古典诗学的异质性在目的语中获得有效传达。

原诗和译诗之间的互文关系可以用中国古代诗话中的“活法”论来加以探究。“活法”在诗歌创作手法上具化为“点化”法，而“夺胎”法和“换骨”法是对“活法”论在言与意、形与神以及文与质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在诗歌翻译中，翻译者也依然可以运用“点化”法、“夺胎”法和“换骨”法实施“活法”翻译策略，从而实现原诗和译诗之间理想的互文性关系。

中国古典诗歌强调天人合一理念，这与在世的现象学主张不谋而合。而诗歌“境界”的建构是对人与自然切近关系的保证，所以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就是对这一“境界”的转化。“境界”的转换亦即“化境”却不得不面对以动词或事件为主导的英语。所以，“化境”也会有两种选择：其一为意象化，其二为事件化。意象化可以取得原诗和译诗之间的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对应。但是事件化则会对这种意象之间的对应性产生威胁。“化境”的结果体现在原诗的对应表达式的句法形态和语义内容上。

翻译的批评者较多地是持再现论的观念，认为译诗是对原诗方方面面的再现，尤其是对原诗诗歌创作理念的复制。其实，诗歌翻译是再现、表现和体现这三种艺术方式的调和性实施。体现论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哲学之上的艺术观念，强调人的身体与语言艺术的关系。其中所包含的心身化结构和物身化结构在诗歌翻译中的继承、置换或消解都是翻译体现论的具体实施。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中，画论和诗论之间历来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为用画论谈论诗歌创造了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山水画的审美旨趣也是中国古典山水诗的审美旨趣。这类诗歌的英译也应该将这些审美旨趣体现出来。但是，因为中西绘画理念之间和中西语言形态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诗歌的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观译”的理想翻译方式在多数情况下无法使用，而被“看译”所取代。

原诗是译者审美感应的触媒，会引发译者进行外向感应和内向感应。两种方向的感应是原诗作者创作时自感后带来的感人的效果。接下来感人之用则成了译者的自感之体，成为了译者在译诗中言志、缘情和载道的载体。原诗的自感之体以感人之用的形态带动了译者的自感之体。诗歌译者的自感形态又产生了诗歌翻译的感应结果：感而觉、感而知、感而动和感而悟。诗歌翻译过程中的这些感应活动首先规定着译者的自感之体，以期通过译诗触发译入语读者的相应的感应活动，从而在译入语读者身上实现感人之用。

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成文论话语的重要元素。诗歌翻译过程与诗歌创作过程虽无法完全叠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对应性。这种对应性保证了可以用文论范畴来批评诗歌翻译。本研究选取了“兴”、“象”、“格”和“圆”这些单体范畴及其勾连而成的双体范畴，这样就可以尝试着从诗歌翻译的发生层面、对象层面、标准层面和目的层面建构诗歌翻译范畴批评话语。

接下来，研究继续使用中国古代哲学和诗论中的范畴解释诗歌翻译的审美距离，认为有五个因素会影响译诗实现原诗的审美饱和度：首先是两个文本在兴发方式上的差异；其次，近譬式与远譬式取材方式会有所不同。其三，译者客观性的“之谓”式表述方式和主观性的“谓之”式表述会影响原诗和译诗之间的审美距离。其四，诗歌翻译中对诗歌器用审美结构的调整也会造成原诗和译诗审美旨趣的差异。最后，“明辨”式或“忘言”式的诗歌语言表征会对诗言与诗意之间的审美距离带来影响。

综上所述，本书企图实现四个面向，即面向过去、面向未来、面向西方和面向中国。只有在这四个面向实现的情况下，一个综合性的翻译诗学体系才能建立起来，从而最终探究出诗歌翻译之道，实现翻译诗学的当代回归。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翻译诗学的当代回归	1
第二章 追寻另一处诗意图栖居地：诗歌翻译的本体论	8
2.1 意义的在场与不在场——翻译的意义观	8
2.2 说不可说——翻译对不在场的超越	11
2.3 神思与想象——翻译过程中的两种运思取向	13
2.4 原文与译文的相同和相通	15
2.5 在遮蔽中澄明——在翻译中寻找另一处诗意图栖居地	18
第三章 “一体万化”：诗歌翻译的通变论	20
3.1 诗歌翻译中的“正”与“变”	20
3.2 由“正变”到“通变”：诗歌翻译的变易模式及其特点	22
3.2.1 诗歌翻译的变易模式	22
3.2.2 诗歌翻译的变易特点	23
3.2.3 诗歌翻译通变过程的核心：生成性	25
3.3 结论	26
第四章 诗歌翻译的现象学考察：诗歌翻译的意向论	28
4.1 诗歌翻译的意向性	28
4.2 诗歌翻译的意向性内容	30
4.3 作为结果的诗歌翻译的意向性关系	34
4.4 结论：诗歌翻译意向性的现象学总体描述	35
第五章 玄言、禅趣和佛理：诗歌翻译的焦虑论	36
5.1 三种类型的古典汉诗及其英译	36
5.1.1 玄言诗、佛理诗和禅趣诗的英译	36
5.1.2 玄言诗	37

5.1.3 佛理诗	38
5.1.4 禅趣诗	38
5.2 诗歌的跨语错位表达	39
5.2.1 禅趣诗译为玄言诗	40
5.2.2 禅趣诗译为佛理诗	40
5.2.3 禅趣诗译为哲言诗	41
5.3 诗歌的跨语表意策略	42
5.3.1 汉诗英译的玄化	42
5.3.2 汉诗英译中的禅化和诗化	43
5.4 诗歌的跨语表意策略背后的语言哲学理念	45
5.4.1 玄化：得意忘象	45
5.4.2 禅化和佛化：不说破与说破	46
5.4.3 诗化：文字的立与不立	47
5.5 结论	48
第六章 格物、感物和体物：诗歌翻译的物我论	49
6.1 引子	49
6.2 诗歌翻译中的格物、感物和体物	49
6.2.1 诗歌翻译和格物	49
6.2.2 诗歌翻译和感物	52
6.2.3 诗歌翻译和体物	54
6.3 结论	57
第七章 言意之辨与象意之合：诗歌翻译的意象论	59
7.1 言与象：两种符号体系的对比	60
7.2 言与意：象表述加入言表述的必要性	61
7.3 象与意：言的式微与象的凸显——汉诗英译的意象主义主张 ...	63
7.4 结论：“通夷狄之言者曰象”	66
第八章 诗歌模子的移植：诗歌翻译的差异论	68
8.1 叶维廉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一种差异翻译诗学	68
8.2 叶维廉的诗歌模子论	69
8.3 模子论对叶维廉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影响	70
8.3.1 叶维廉翻译诗学中的传释学	70

8.3.2 叶维廉翻译诗学的语言观	71
8.3.3 叶维廉翻译诗学的主客关系	73
8.4 结论	76
第九章 从“点化”到“夺胎换骨”：诗歌翻译的活法论 ...	78
9.1 引言	78
9.2 诗歌翻译的“活法”	79
9.2.1 诗歌翻译的“点化”法	79
9.2.2 诗歌翻译的“夺胎”法和“换骨”法	85
9.2.3 诗歌翻译的“活法”	87
9.3 结论	91
第十章 从意象到事件：诗歌翻译的化境论.....	92
10.1 引言	92
10.2 中国诗学中的“境界”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意涵	94
10.3 汉诗英译中的化境与事件化	96
10.3.1 汉诗英译中的事件化	96
10.3.2 汉诗英译中化境的事件化处理方式例释	101
10.4 汉诗英译中事件化对境界转化的审美影响	104
10.5 结论	106
第十一章 物身化和心身化：诗歌翻译的体现论	108
11.1 诗歌翻译的再现论、表现论和印象论	108
11.2 诗歌翻译的体现论：心身化和物身化	110
11.2.1 诗歌翻译中的心身化 (somatization)	111
11.2.2 诗歌翻译中的物身化 (embodiment)	115
11.3 结论	119
第十二章 “观译”和“看译”：诗歌翻译的观看论	120
12.1 “以大观小”：中国古典山水诗的本体论基础及其翻译效应....	120
12.2 “观译”与“看译”：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两种取向	123
12.2.1 “假山”之译与“真山”之译	125
12.2.2 “散点”之译与“焦点”之译	126
12.2.3 “动点”之译与“静点”之译	127